

查良鏞先生的十九歲——往重慶求學的兩則資料

鄭振偉*

目 录

1. 前言
2. 重慶教育部和廣東省教育廳往來的電文
3. 查良鏞致教育部的親筆信件
4. 查良鏞投考各學校的情況
5. 小結

1. 前言

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期間設有各種救助機構，包括戰區學生指導處，為逃離戰區的學生提供升學和就業方面的救濟安排。凡選擇繼續學業者，經審查合格後即可以借讀或轉讀的方式安排就學，而政府也有貸金政策。及後淪陷地區日增，教育部為救濟學生，凡未及考入專科以上學校者，予以登記驗證後，即分發至先修班肄業¹⁾。1942年5月-9月的浙贛戰事，對於救濟戰區青年，政府亦積極辦理招訓工作。教育部本來就有戰區學生招致訓練會，各戰區亦設有分會，負責辦理招致、接待和分配訓練等事項，至於登記考試入學則由各該省教育廳和專科以上學校負責辦理，而當時教育部在蘇南、皖南和閩北各地都設有招待

*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副教授

1) 中華民國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上海：商務，1948），第576-577頁。

點²⁾。查良鏞十九歲前後經歷的正是這個戰亂和流徙的年代。

2. 重慶教育部和廣東省教育廳往來的電文

查良鏞先生19歲的時候正值浙贛戰事，筆者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案卷中找到兩份相關的珍貴資料。檔案館供閱讀的是電子掃描檔，第一份資料包含重慶教育部和廣東省教育廳往來的電文，以及「廣東省教育廳收容戰區退出學生登記表」³⁾。在曲江縣城韶關的廣東省教廳於1942年11月11日發出兩封電文，其中一封有七名學生，另一封有一名學生，前一封電文的內容如下：

廣東省政府教育廳代電//教育廳重慶教育部鈞鑒：現據上海私立新本女子中學校等畢業生張履冰、鄭雲章、許祖雄、張耀、陸綸、唐日新、查良鏞等七名，各呈具表件遵章申請登記前來，除將登記表各抽存乙份外，理合連同原繳證件呈報察核電示祇遵。計附張履冰等證明書七紙、登記表七份、相片五張。韶廣東省教育廳長黃麟書酉(戌真)三戰印。

教育部於12月9日分別回復國立中山大學和廣東省教育廳，編號分別為高字第50696號和50697號。原文如下：

(一)

電5789//坪石「中山大學」：分發查良鏞、張履冰、陸綸、唐日新、張耀、許祖雄、鄭雲章、徐國盛等八名入該校先修班肄業，仰驗證收容。教(育)部()印亥青高。

(二) 代電//廣東省教育廳：本年十一月十一日三戰字第一一〇三、四兩電

2) 《救濟浙贛戰區青年，積極辦招訓工作》，《中央日報/掃蕩報》(重慶)，1942年9月30日第5版。

3)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中山大學呈報僑生甄試錄取名冊、登記表及有關文件》，教育部全宗號五/案卷號5888(2)/1942.9-1943.8，第55-66頁。本文引述原文標點大多為筆者所加或調整，謹此說明。

暨附件均悉。准予分發查良鏞、張履冰、陸綸、唐日新、張耀、許祖雄、鄭雲章、徐國盛等八名入國立中山大學先修班肄業。仰即轉飭該生速即持同學歷證件徑赴該校報到入學。登記表存部備查，餘件發還。教育部(文)附件。

該案卷中八名學生的登記表保存完好，從登記的資料來看，各人於1942年8月至10月期間先後抵達韶關，當中有三名僑生。查良鏞與其他七名來自不同地方的學生似沒有任何關係，應是廣東省政府教育廳於各人登記以後一併呈報重慶教育部辦理。查良鏞的登記表上各個欄位的資料如下：姓名「查良鏞」，性別「男」，年齡「十九」，籍貫「浙江」，現在地址「廣西桂林環湖北路八號毛咸先生轉」，原肄業學校(校名/科別/年級)「浙江省立衢州中學高中畢業」，離校年月「卅一年七月廿九日」，到韶年月「卅一年九月十五日」，原擬借讀何校何年級「國立中山大學法學院經濟系」，證件或聯保人「畢業證明書」，在韶之親戚姓名及地址，空白，備考「畢業證明書經驗證後彙報教部未發還」。表格下方有辦理登記人員的印章，辦理日期為「卅一年十月五日」。又登記表的右上方貼有查良鏞的半身照。這些資料明確顯示查良鏞於1942年9月15日抵達韶關，並於1942年12月獲教育部分發至粵北坪石的中山大學先修班。分發的意思就是不用再經考試，案卷中還有其他個案，有的是空白，有的是「擬准」、「未便照准」，又或「自行報考」。

3. 查良鏞致教育部的親筆信件

能看到重慶教育部和廣東省教育廳往來的電文實屬難得，但筆者之後又再發現查良鏞的一封親筆信⁴⁾。謹轉錄如下：

敬啟者：學生查良鏞籍貫浙江海寧男性十九歲，本屆於浙江省立衢州中學

4)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各地學生僑生及各機構呈請分發保送准入各大學先修班學習等事宜與教育部的往來文書》，教育部全宗號五/案卷號6093(1)/1942.8-1942.11，第173-174頁。

高中部畢業。此次因浙贛戰事發生，倉皇經江西、廣東、湖南等地而至桂林，因途中勞頓跋涉，在江西南豐縣臥病達二月餘，故至江西贛縣時已九月八日(有南昌青年會文件證明)，至廣東曲江已九月十五日(有廣東省教育廳文件證明)，已桂林已九月十八日(有桂林青年會文件證明)，各大學招生考期均已差過。生於十月一日曾有報告請求 貴部分發至國立大學肄業，想已先此收到，日昨見 鈞部頒佈之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學籍之規定中有載明，在戰時凡高中畢業生因特殊故障而不及參加大學之入學試驗者，可請教育部核准在大學中試讀，肄業一年後，如成績及格，再參加次年之新生入學試驗，成績及格即可轉為正式學生。自維尚合於此項規定，故再行申請，祈分發至國立中山大學肄業。生之志願為法學院經濟系(能分發至中央大學、西南聯大、復旦大學亦所願意)，實因不及參加考試(在江西南豐生病時居於南城遷來之三民主義青年團南城分團部，如屬需要，生可請該部出具證明書，南豐博濟醫院及長安診療所亦可出證明書)，且生現在桂林，舉目無親，途中衣物棉被散失殆盡，現經濟異常窘迫，日常生活僅靠中央振濟會第九振濟會所發之少數生活費維持，而繼續求學之心則非常迫切。生此次在衢州中學以第一名畢業，在校中六學期均為公費生，每學期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以上情形可向浙江省教育廳調查，純系屬實。如能分發，至學校後，生願受任何考試，如成績不及該校之錄取新生標準，自願不能肄業，因生自信平素對高中各項功課均尚有根柢也。生有淪陷區退出之檔，畢業證明書於九月十五日至廣東省教育廳登記請求救濟時已由該廳送部核驗，可請抽驗之。現有廣東省教育廳出具之收據。為以環境困難，熱心向學，務祈照準為禱。如至中央大學能入學，則生自當排除萬難，即日來渝，因生之惟一志願，即為入中央大學也。無論可否，均請賜一覆書。通訊處：「廣西桂林環湖北路八號毛咸先生轉」。懇切上聞，專此敬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鈞鑒//學生查良鏞謹啟//十月七日//同行來桂之同學皆得復入桂林高中求學，而生則以高中畢業，故無校可進，務請准予分發。

原手稿或有筆誤，此處不作訂正。衢州於1942年6月7日淪陷。根據衢州中學昔日師生的回憶，浙江省立衢州中學的校址原在衢州城府山，1939年的時候已遷至石梁；1942年5日日軍侵擾浙西，衢州告急，校長陳博文決定遷校，師生於5月23或24日全部遷離。衢中遷校的第一站是常山縣芳村，但只停留約一個月，因日軍侵擾加劇，也傳聞有人企圖搶劫，學校於是再遷往遂安縣夏洲村，大約是當年的七月。浙贛西段的日軍於8月底撤回原防。衢州中學於1943年2月遷回

石梁⁵⁾。

1942年各大學的試期應是七月中以後，查良鏞臥病兩個月，肯定錯過試期。查良鏞在信中提及同行赴桂的同學，假設是同行，理應與查良鏞一起向廣東省教育廳登記救濟，但上文提及的登記表未見有衢州中學的高中學生，而同行的人於抵達桂林後即轉讀桂林高中。查良鏞在南豐因病滯留兩個多月，夥伴同行的情況並不清楚，所以也可能是查良鏞抵達桂林後再跟各人會合。浙贛戰事始於1942年5月中旬，查良鏞走的路線從浙江衢洲石梁鎮開始，到過江西的南豐縣和贛縣，之後是曲江，再到桂林。查良鏞表示當時衣物棉被盡失，只靠一點救濟費維生，雖然生活困窘，但字裡行間對於自己的能力充滿自信，當時希望能分發至國立中山大學，但更大的志願是「法學院經濟系」和「中央大學」。查良鏞於9月15日抵達曲江，即日便到省政府教育廳登記，登記表上填報借讀國立中山大學的志願，但之後即啟程前往桂林，10月7日信件上的通訊處是「廣西桂林環湖北路八號」，與登記表上的地址完全相同，足以說明查良鏞在韶關時已知道自己的去向。登記表上的其他資料與信中的資料基本相同。這封信的內容還有一個特點，查良鏞多番強調自己有不同的證明，包括「淪陷區退出之檔」，也有「南昌青年會」、「廣東省教育廳」和「桂林青年會」等單位的檔，也可請求「三民主義青年團南城分團部」和「南豐博濟醫院及長安診療所」出具證明，可以猜想戰區退出來的學生當時必須有足夠憑證以資證明身份，而最重要的應是經廣東省政府教育廳呈繳的畢業證書，但當時的教育部應該還沒收到相關的登記表和畢業證明書，因上文提及的「廣東省政府教育廳代電」是11月11日發的，而這一封信於10月16日已寄達重慶的教育部(見下)。

5) 范炳榮：《衢州中學從石梁到夏洲村》，《衢州文史資料》，第7輯(1989年9月)，第298-300頁；葉志麟：《難忘的艱苦歲月——在衢中六年》，同上，第293-297頁；陳康白、許傑：《餓鄉三月》，同上，第237-239頁，原文刊於1942年10月16日《東南日報》副刊「筆壘」第1151期。另參《抗日戰爭正面戰場》(張文憲主編，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5年6月)，第289-298頁。

上述信件中的內容顯示查良鏞另有一封寫於10月1日的信件，惜未有發現。案卷中的該組文件另有一頁「教育部文電摘要紙」(172頁)，備考一欄蓋印1942年10月16日收到，批示一欄蓋印10月17日下午到高等司，事由一欄填寫「懇請分發入學」，擬辦一欄見三列文字和多個簽名，但難以辨讀，文字可能是「(前呈----第四九〇三四號)//已分發-----先修班//此件擬存」，簽名者包括陳立夫和吳俊升等。如辨讀無誤，即10月1日的信件已見於當時的案牘。相同標題的案卷共三個，案卷號和起訖時間分別是 6093(1)/1942.8-1942.11、6093(2)1942.1-1942.9和6093(3)1941.12-1942.8，而案卷中的各組檔也不全是按日期順時排列，筆者檢讀另外的兩個案卷後也再無發現。

4. 查良鏞投考各學校的情況

查良鏞再次致函教育部申請，表示入讀中山大學的意願，但獲分發至先修班，他是否前往，不得而知；1943年8月9日國立中山大學公佈各院系的新生名單上，未見有查良鏞的名字，也未見有其他獲分發該校的學生名字⁶⁾。當年的中央賑濟委員會命該會第七救濟區對於經韶赴桂林和重慶等地升學的學生，全部發給免費乘車證⁷⁾。既然查良鏞強調自己惟一的志願是入讀中央大學，故筆者也就順便追縱相關的資料。《中央日報》於1943年9月11-14日連續四天公佈「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錄取各區新生的通告，錄取名單上合共539名學生，查良鏞的名字就在「重慶區」考生的名單上，依第一志願錄取⁸⁾。這說明查良鏞當時已

6) 《本校三十二年度新生放榜》，《國立中山大學校友通訊》，第40-41期(1943年10月1日)，第4-5頁。

7) 《浙贛退出學生，赴桂渝升學者發給車證》，《教育導報》(廣東省政府教育廳編印)，第29期(1942年10月)，第6頁。查抗戰期間共有兩個第七救濟區，1942年廣東省曲江增設第七救濟區，管轄廣東福建兩省救事宜，見孫豔魁：《苦難的人流——抗戰時期的難民》(桂林：廣西師範大學，1994年12月)，第157頁。

8) 《中央政治學校本年度錄取新生通告》，《中央日報》(重慶)，1943年9月14日第4版。

排除萬難抵達重慶。名單上還有依第二志願錄取的名單和語文專修科的錄取名單，蘭州區的名單有待公佈，獲錄取的學生限於11月1日至20日期間到重慶小溫泉該校報到，逾期者將取消入學資格。但由於當日的新生宿舍未及落成，新生的報到日期延至11月10日起至25日止，保送生則延至11月5日起至20日止⁹⁾。另外，「國立中央大學」於9月6日亦公佈了重慶、成都和貴陽三處新生或轉學生的錄取名單，文學院52名、理學院64名、法學院127名、師範學院124名、農學院69名、醫學院49名、工學院190名，另二年級轉學生6名，查良鏞的名字就在師範學院的名單上¹⁰⁾。國立中央大學三十二年度招考新生，報名和考試日期分別是7月21-28日和8月1-3日¹¹⁾，考生共有5947名¹²⁾，法學院占1482名，約錄取8.56%，而師範學院占717名，約錄取17.29%。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通告末端其中一個「注意」事項：「凡因志願投考之院系名額已滿而取入性質相近之院系者入學後不得請求改轉院系」。查良鏞在信中說他惟一的志願是入讀中央大學，但後來的選擇是中央政治學校，除了因為中央政治學校是免費以外，這個「注意」也許是其中一個原因——入讀師範學院後不得請求改轉院系。

查良鏞是否同時報考了其他大學？查良鏞的信中還提及復旦大學和西南聯大，復旦大學的報名和考試日期分別是7月25-27日和7月30-31日，西南聯大的報名和考試日期分別是7月19-20日和7月28日起。此外，當時的國立四川大學「法學院法律系及司法組政治系經濟系」也在招生，報名日期是7月30日-8月3日，考試日期是8月6-8日¹³⁾。各校之間的試期，及其與國立政治學校和國立中央大學的試期亦無衝突，就資料所見，西南聯大錄取新生的名單上有查良鏞的名字，但名字是列在文學院而並非法商學院¹⁴⁾。

9) 《中央政治學校緊要通告》，《中央日報》(重慶)，1943年10月15日第1版。

10) 《國立中央大學錄取新轉學生通告》，《中央日報》(重慶)，1943年9月6日第4版。

11) 《國立中央大學招考新生及轉學生》，《中央日報》(重慶)，1943年6月25日第1版。

12) 《從中大考生看青年求學旨趣》，《中央日報》(重慶)，1943年8月8日第3版。

13)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三十二年度招生廣告》，《國立復旦大學招生廣告》，《國立四川大學招考新生通告》，《中央日報》(重慶)，1943年7月18日第1版。

14)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招考新生揭曉廣告》，《大公報》(重慶)，1943年8月20日第1版；《國立四川大學錄取重慶區新生通告》，《中央日報》(重慶)，1943年9月16日第4版；《國文

中央政治學校直接隸屬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該校原是國民黨培植革命建國人員的機關，與普通大學隸屬於教育部者不同。該校始於1927年5月所創辦中央黨務學校，修業年限原為一年，1929年6月改為4年，並以黨校第二期學生為政校第一期學生，1947年2月該校奉令與青年團中央幹部學校合併，改組為國立政治大學¹⁵⁾。從1943年7月份刊登的招生廣告所見，該校在重慶、成都、西安、蘭州、洛陽、桂林、昆明、泰和、永安和雲和等地共設置十個考試點，招一年級新生四百名，但前此教育部1943年6月5日高字第26723號訓令「中央政治學校三十二年度招考新生，除由該校招考三百名外，另行規定二百六十一名，由各省市縣教育廳局保送」¹⁶⁾。重慶考區設在該校本部即南岸小溫泉，7月20-22日報名，23-24日口試，25-26日筆試¹⁷⁾。根據同屆考生饒敏卿所述，中央政治學校考取三十二年度應考人數8546名，錄取635人¹⁸⁾。考生須呈繳畢業證書、相片和體格及格證書。招生簡章規定的體格標準，男生須身長在158公分，體重45公斤，女生身長154公分，體重在42公斤以上。這是劃一的標準，饒敏卿的文章並記重慶區2325名考生中，體格不及者多達472人。饒敏卿於1942年春畢業於浙江省立金華中學高中，也因為浙贛戰事而錯過試期，他的名字見於雲和區依第二志願錄取名單上(雲和區第一志願錄取33名，第二志願11名)。他是9月29日接獲錄取通知，之後從浙東經閩贛湘桂黔至渝，走了三千多公里路，歷時34天¹⁹⁾。根據另一位曾重考的學生所述，口試沒有一定的範圍，視乎主管人員而定，時間也可長可短，老先生和新先生的問題也不同，該文還記下兩次口試須回答的問題，作者的建議是要多留心報章雜誌，而態度和

復旦大學三十二學年度秋季錄取新生及轉學生揭曉》，《中央日報》(重慶)，1943年8月18日第1版。

15) 中華民國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第596-597頁。

16) 《電發中央政治學校三十二年度保送學生辦法飭各高級中學遵照保送》，《國民教育指導月刊》(廣西省政府教育廳)，2卷7期(1943年)，第44-45頁。

17)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招生廣告》，《中央日報》(重慶)，1943年6月28日第4版。

18) 來自饒敏卿的這個數字完全準確，《中央日報》於1943年9月11日公佈的大學本部錄取的新生是593名，如計入語文專修科42名學生，剛好是635人。

19) 饒敏卿：《中央政治學校》，《中央週刊》，6卷36期(1943年)，第484-485頁。

口才尤關重要；筆試共六科，分別是國文、英文、黨義、數學(高等代數和解析幾何)、中外史地和理化²⁰)。

當時的中央政治學校設有大學部、專修部和公務員訓練部。大學部設有法政、經濟、外交、地政和新聞五系，法政系分行政和法制兩組，經濟系分經濟行政、財政金融和統計三組，地政系分土地行政和土地金融兩組，外交和新聞兩系不分組，肄業期各為四年。專修部設地政、新聞、統計和語文專修科，語文專修科又再分蒙文、藏文和印度文三組。三十二年度只招上列五學系和語文專修科新生。公務員訓練部分高等科和普通科，分別收考試院高等考試初試及格和考試院普通考試及格的人員，前者訓練期四個月，後者半年，訓練期滿再試及格即可分發中央及地方行政機關服務。查良鏞入學以後的生活和學習情況如何？上述饒敏卿一文關於該校的學習和生活有詳細的記錄，可資參考：

首為始業教育：始業教育為本校各科系班學生必經之階段，新生一進校，即開始始業教育，惟期間長短各異。按以往規定，大學部為一學期，專修科為三個月，普通科一個月，高等科三星期。始業教育期內，除授以基本課目外，更有精神訓練與軍事訓練。精神訓練之範圍甚廣，有關於本校之認識者，如本校校史、沿革、組織系統、教育宗旨與內容等。有關於本黨之認識者，如黨史、總理及總裁革命史、主義、政綱、政策等。有關於國內外大勢之認識者，加本國文化、政治、經濟概況，及國際情形等。有關於生活之訓練者，如立身處世為學辦事之方法等。此外又有音樂訓練以培養愛美之情感，有體育訓練以鍛煉堅強之體格，軍事訓練分學術科訓練及軍事管理二者，學術科訓練授現代國防知識，軍事學術科之基本要義，及軍事之基本技能。軍事管理在使學生養成簡單樸素，整齊清潔，勤勞刻苦之生活習慣，熟習確實、迅速靜肅、秘密之行動要領……本校設有特別黨部，下設若干區黨部，每一區黨部之下，分若干區分部，區分部之下，又分若干小組，每一學生均編入此組織系統內，而以區分部在小組討論會為實施訓練之重要機構。小組討論會每週舉行一次，由主管訓導列席指導。學生除參加小組會議外，又由訓導指定閱讀總理遺教等書，讀後各筆作記，送交主管訓導批閱。²¹)

20) 鼎銘：《怎樣投考中央政治學校》，《中央週刊》，5卷49期(1943年)，第409-412頁。

21) 饒敏卿：《中央政治學校》，《中央週刊》，6卷36期(1943年)，第484-485頁。

由此可見，校內的管理相當嚴格。中央政治學校的大學部設於小溫泉，而這個校部原是重慶的名勝，饒敏卿描寫得非常優美，「四山環繞，花溪曲折，流貫其間，林木叢生，鬱鬱蒼翠，學舍錯落，掩映於綠蔭叢中，恬靜清幽，遠絕市囂。課餘暇日，利涉橋邊，憑欄遠眺，則可見萬山夕照，瀑布奔流之勝；花灘溪裡，扁舟蕩漾，則可覽數峰競秀，飛泉奔霧之奇」。該校學生的膳食由學校供給，衣履如棉大衣、棉軍服、單軍服、綁腿、皮帶、帳、枕等，也全部由學校供給，學生每月並可獲發二十元零用。理髮和洗衣免費，校方更把溫泉辟為浴室和游泳池。圖書館約有五萬冊藏書，學校有法政研究會、經濟研究會之類的研究會社共十五個，研究會刊物出版之時，貼滿了走廊壁間。校內也不時舉行美術展覽會，展出中西圖畫、木刻和刺繡，又有歌詠團、話劇社、國樂平劇等組織，每逢節日或國慶和校慶，禮堂內歌聲舞影。此外，學生也注重個人的體格鍛煉。饒敏卿記述的簡直是人間樂土，與戰區何啻天壤。筆者試比較另一篇文章，該文作者以為即使在軍事管理之下，但在相當範圍內仍然是很自由的，也認為該校的生活環境優美，同學有求知精神，運動風氣好，生活上受著政府的優遇，學術研究和藝術生活也很豐富²²⁾。故即使饒文有誇張之嫌，但某些學習和生活條件也應屬客觀事實。

5. 小結

查良鏞沒給自己寫傳，但某些傳記是經過他本人審核和改正過的，某些立傳者也跟他做過訪談以收集資料，而他也許認為沒必要告訴別人自己的所有經歷。查良鏞入讀中央政治學校一年多便遭勒令退學，不管是因為對校內的某些現象打抱不平，又或是不願投筆從戎²³⁾，但他離開了中央政治學校後得表兄幫

22) 戴樹柵：《中央政治學校生活素描》，《學生之友》，第9卷1-2期合刊(1944年11月15日)，第38-41頁。

23) 傅國湧：《金庸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修訂版)，第49頁。

助而在國立中央圖書館任職，卻又有機會大量閱讀西方文學的原著和譯本。年僅19歲，已經歷烽火硝煙、求學入學失學。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一些主角在成長過程中經歷艱辛，筆者無意於索隱，但個人經歷是否隱含其中，或未可知。儘管這些際遇暫難揭示與他日後創作武俠小說的因緣，然而卻也不是絕對。查良鏞在中央政治學校就讀那年的暑假裡，除了讀《資治通鑒》以外，還讀威爾斯的《世界史綱》，睏了便直截睡在窄窄的長檯上，睡了一個暑假從來沒有在夢中掉下來過。《神雕俠侶》寫小龍女在一條懸空的繩子上睡覺，查良鏞曾憶述這也許就是創作靈感的來源²⁴。在結論補上這一筆，旨在說明本文整理出來的一段經歷的意義仍有待進一步的探索。學術界雖然有不少金庸傳記的專著，但關於查良鏞19歲的這段經歷，只有傅國湧的《金庸傳》(修訂版)寫得比較詳細。作者引述程正迦的回憶錄，補充了查良鏞與另外七名同學(江文煥、王浩然、黃文俊、吳汝榕、程正迦、程正返和朱卿雲)結伴西行的經歷，各人大約是在贛州分道揚鑣，查良鏞表示去湖南找老同學，1942年冬輾轉到達湘西²⁵。傅著的一大特色是成功利用檔案的資料，其中包括杭州市、衢州市和浙江省檔案館的皮藏²⁶，筆者在二檔館無意中也發現了兩則，謹此也略作補苴。查良鏞先生已逝，亦盼以茲紀念。

24)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金庸 / 池田大作對話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7-8頁。

25) 傅國湧：《金庸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修訂版)，第45-46頁。

26) 崔德旭：《從〈金庸傳〉看檔案信息資源開發利用》，《山西檔案》，2013年6期，第76-77頁。

參考文獻

- 《大公報》(重慶), 1943年.
- 《中央日報/掃蕩報》(重慶), 1942年.
- 《中央日報》(重慶), 1943年.
- 《中央週刊》, 1943年.
- 《國民教育指導月刊》(廣西省政府教育廳), 1943年.
- 《國立中山大學校友通訊》, 1943年.
- 《教育導報》(廣東省政府教育廳編印), 1942年.
- 《學生之友》(學生之友月刊社), 1944年.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中山大學呈報僑生甄試錄取名冊、登記表及有關文件》, 教育部全宗號五/案卷號5888(2)/1942.9-1943.8.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各地學生僑生及各機構呈請分發保送准入各大學先修班學習等事宜與教育部的往來文書》, 教育部全宗號五 /案卷號6093(1)/1942.8-1942.11。
- 中華民國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 上海:商務, 1948年.
- 孫豔魁:《苦難的人流——抗戰時期的難民》,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1994年12月.
- 崔穗旭:〈從《金庸傳》看檔案信息資源開發利用〉,《山西檔案》, 2013年6期, 第76-77頁.
- 張文憲主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 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15年6月.
- 傅國湧:《金庸傳》,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 修訂版.
- 衢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衢州文史資料》, 第7輯,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年9月.
-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金庸 / 池田大作對話錄》,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Abstract

Mr. Cha Leung-yung at his Late Teens: Two Archival Fragments of his Journey for Study Pursuit in Chongqing

Cheng, George Chun Wai

There are no less than ten different versions of Mr Louis Cha Leung-yung's biography. However, very few of them touched upon or gave a detailed account of his activities at his late teens, the time when he graduated from Quzhou High School and then entered the Central Political Institute. A revised edition of Fu Guoyong's *The Biography of Jin Yong* came out in 2013, with reference to Cheng Zhengjia's memoirs, supplemented some details about the activities of Louis Cha. To add further information, this article uses two newly discovered archives, i.e. a student registration form and a letter from Louis Cha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he past, there have been different accounts of Louis Cha's birth date. These two archives show that Louis Cha was 19 years old in September 1942. Moreover, his adventure, activities and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during that difficult period are also revealed. In order to provid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Louis Cha's experience at that time, the examinations he took and his subsequent study life, references are made to two pieces of articles written by two fellow students of his time. Some information from dated newspapers are also retrieved to clarify the admission offers made to him by different tertiary institutions.

Key words: Central Political Institute, Biography of Jin Yong, War Zone Youth

투 고 일: 2020. 10. 10. / 심 사 일: 2020. 10. 15. ~ 2020. 11. 15. / 게재확정일: 2020. 11. 20.

